

李大钧 李大宏 著

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第七辑）

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大同晉商

山西出版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李大钧 李大宏 著

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第七辑）
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大同晋商

山西出版集团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同晋商/李大钧, 李大宏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11

(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第7辑/董瑞山主编)

ISBN 978-7-203-05875-5

I. 大... II. ①李... ②李... III. 商业史—大同市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3522 号

大同晋商 (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第7辑)

著 者: 李大钧 李大宏

责任编辑: 蒙莉莉

装帧设计: 冀小利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08 (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省史志印刷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总 印 张: 16.875

总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1-3000 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5875-5

定 价: 86.00 元 (全 10 册)

“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董瑞山

副 主 任：高 平 古鸿飞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力高才 古鸿飞 赵一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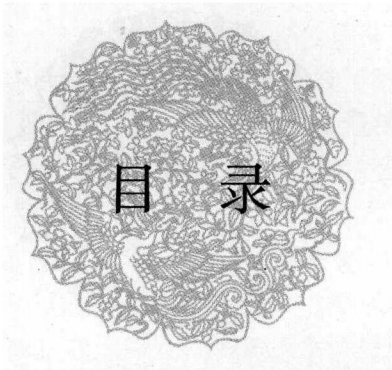
姚 斌 要子瑾 高 平

袁海明 葛世民 董瑞山

主 编：董瑞山

执行副主编：高 平 古鸿飞

副 主 编：葛世民 姚 斌



目 录

引 子	1
明代边市引凤凰	3
军镇经济畸形繁荣	3
陆路口岸连接四方	7
边境互市时盛时衰	11
城市街巷市井画卷	16
清代商帮美名扬	19
众多字号铭记贞珉	19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24
大同晋商走遍全国	28
丰富遗产遍布名城	31
近代资本铸辉煌	35
各项实业快速发展	35
商品交易欲罢不能	41
晋商世家辈出云中	45
名家大院各显风采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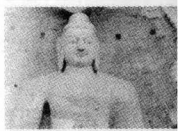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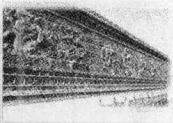
引子

晋帮商人是明清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崛起的重要商业集团。这个以地域为商派体系,以会馆为联系纽带,组织性和网络性很强的商业集团,纵横驰骋,往来拼搏,雄踞国内商界达5个多世纪,在中国商业史乃至世界商业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说起晋商,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叱咤风云的山西票号,走南闯北的晋帮茶商,遐迩闻名的豪宅大院……相形之下,晋北大同的商家却显得名不见经传。其实,明清时期的商业集团之所以能够在山西崛起,恰恰是因为山西北部的大同,曾经是全国军事体系中的九边重镇之首。晋商研究专家,山西省社科院张正明先生在《明清晋帮商人的兴衰》一文中强调指出:“晋帮商人主要是借助明政府开中法的实施和利用山西靠近北方边镇的有利地理位置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实际上,大同晋商起步时间要更早一些。元王朝统一中国以后,在全国实行了行省管理制度。当时,“中书省统山东、河北之地,谓之腹里”(《元史·地理志》),为了便于管理,至元年间在中书省的下面,率先设置了山东东西道、河东山西道两个宣慰司。河东山西道宣慰司管辖山西北部的大同路、山西中部以太原为中心的冀宁路、山西南部以平阳(临汾)为中心的晋宁路3个路级行政区,辖区要比今天的山西省





略大一些。河东山西道宣慰司的治所,设置在大同路。也就是说,山西省最早的省会城市,设在山西北部的大同。

由于占据了省会城市的优势,元代大同地区的各项商贸活动异常活跃。元人王恽《秋涧大全集·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书孙公神道碑铭》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大同各地扩匠作42万人,立局院70余所,发展起元王朝最庞大的工商基地。《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元代大同路境内的居民,很大部分“以商工为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元代山西省会城市的大同,引领了元代三晋商贸各业的发展。

明代,大同军镇经济的畸形繁荣,带动了山西全省商贸各业的蓬勃兴起;山西境内唯一的对外口岸就设在塞北的长城古堡,大同马市的开放,让山西商人饱尝了对外贸易的甜头。

清代,大同当地特色产业持续发展,许多大同人将买卖做到了全国各地,万余家各类字号铭刻在寺庙碑记之上。在晋中、晋南商人逐步走向全国之时,大同晋商独辟蹊径,闯出了一条招商引资的康庄大道。

近代,大同晋商更是脱颖而出,创造了一个天大的奇迹,一举将一个偏僻小县发展为遐迩闻名的工商业城市。大同晋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崛起的关键时刻及时转型,使无数人体验到工商业革命的实惠。

大同晋商无疑是晋帮商人中最成功的群体之一。晋帮商人开拓创业的进程中,大同晋商曾引领先河;晋帮商人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大同晋商曾独树一帜;晋帮商人逐渐衰落的路程中,大同晋商曾借机转型。若身临其境,到这片土地上走走看看,感受大同晋商的真谛,领略大同晋商的风采,自会收获不少!

明代边市引凤凰



明代是大批晋商世家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时期。而大同军镇经济的畸形发展,边境马市的口岸贸易,都从某种意义上成为明代晋商世家兴起、三晋各业蓬勃发展的直接诱因。也可以这样说,正是明代大同特殊的经济环境,促成了明清时期晋商的兴盛。

军镇经济畸形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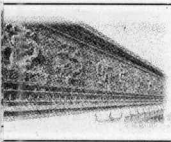
有学者论述说,真正诱发明清之际晋商打通茶马古道,将买卖做遍全国各地,进而走出国门的重要因素,首先是明代大同军镇经济的畸形发展。

明朝建立后,明中央为了防止蒙古贵族不断南侵,沿长城一线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9个边防军事重镇,俗称“九边”。在这9个边防军镇中,大同镇因“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故战略地位尤为突出。

为了加强防御能力,明朝在大同一线布置了雄厚的军事力量。明正德《大同府志》记载大同镇的军事建制为:“国朝山西行都司并所属卫所,见在官三千一百八十四员……原额旗军共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二名……骑操马共三万一千



明代边市引凤凰



七百八十五匹。”“屯田，地一万一千五百八十二顷。岁纳夏秋粮一十万五千四百九十二石，草一十七万五千八百二十束。”

明王朝与蒙古贵族之间的长期争战，本身是一场巨大的消耗。九边军镇在有力防止元朝残余力量南侵的同时，也给明王朝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据《明实录》记载，明廷给大同镇的军费开支银两，最高时竟占去了明王朝全年财政收入的 1/4。

关于大同镇的军费开支，《明史》记载说：“大同：主兵，屯粮本色七万余石，折色银一万六千余两，牛具银八千余两，盐钞银一千余两，民运本色米七千余石，折色银四十五万六千余两，屯田及民运本色草二百六十八万余束，折草银二万八千余两，淮、芦盐四万三千余引，京运年例银二十六万九千余两；客兵，京运银十八万一千两，淮、芦盐七万引。”有关大同镇军事装备及军需供给等方面的情况，明万历年间刊刻的专著《三云筹俎考》介绍得更为详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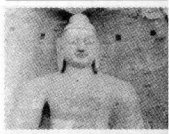
从上面记载中，可以了解到明朝边镇的军需主要来自屯粮、民运、盐引、京运 4 个方面，大同镇军费开支每年除粮草等本色实物外，还需要折色白银近 100 万两。大同著名史志学者侯长发先生所著《明代大同地区以军事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一文，对于明代大同地区军镇经济状况进行了系统研究。

上面史料介绍大同军费收入中最大的一项是民运，《明实录》记载说：“大同、宣府岁用甚伙，而屯田所入不及十一，余皆仰给于民……”侯长发先生指出：“由于北方各镇驻军屯田所产出的谷物，不能维持正常的供给，于是便产生了‘民运粮’。所谓民运粮，即北方几个省的农民，本应向当地政府交纳的地亩捐粮，不在当地交纳，改由向政府指定的边塞地区，自己运输粮食去交纳。”

负责往边境运送粮食的大批各地农民,面对路途遥远、山川险峻、气象灾害等各种艰险,每运送一石粮食,运费高达六七石之多,百姓苦不堪言。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明政府对交纳民运粮进行了变通。各地农民可以送那些比较容易运输的物资,如土特产等,到指定的交粮地点附近,进行交易,换成米粮后再行交纳。”整个山西特别是晋南各地的“农民带着各种物资,来大同进行交易,便无形中促进了大同的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大同在明代作为一个商业城市便蓬勃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在明代,大同以军事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的核心部分,我们不能低估这其中含有的重大意义”。(侯长发《明代大同地区以军事为中心的社会经济》)

军饷的另一项重要来源是盐引。盐在历代都是国家专卖品。明代盐法中,有一个“开中法”最为著名:“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明史·食货志》)这就是说,明代盐业管理方面最成功的立法,就是始于大同等地的“开中法”。它促使商人把军粮饲草积极运送到边城,然后换取一定份额的食盐经营权,从而有力保障了边疆地区的军饷供应。

侯长发《明代大同地区以军事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一文辑录了很多史料,其中有《明实录》记载景泰四年(1453)“山西、河南、正定、保定、临清等处军民客商,往大同、宣府输纳粮草军装,及贩马、牛、布、绢、香、茶、器皿、果品……”《明实录》记载万历四十五年(1617)“大同杀胡堡为云中第一冲要地,虏自献诚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明崇祯《山西通志》记载大同府“若至陆驮水航之物,藏山隐海之珍,靡不辐辏而至者,大多东南之产,而转贩之力也”,



明代边市引凤凰

《五杂俎》记载：“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集中反映了明代全国各地特别是山西商人把大同军镇作为一个商品消费的重要地带，为促进大同军镇经济的繁荣昌盛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侯长发先生深刻总结了大同军镇经济得以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说：“为什么大同在明代会发展成为一个相当繁华的商业城市呢？原因就在于，这里有大量的驻军，有频繁发生的战争，这里有大量的消耗，明政府为了支持战争，就得支出大量的军饷，商人们为了追逐利润，把各种物资运到这里，赚取军饷中的白银。”

明正德《大同府志》有一段话概括了明代大同的繁荣：“大同地方广袤数百里，僻州山县，士农之家，人尚勤俭，有古之遗风。郡城内藩府有常禄之供，将士有世禄之养，商旅辐辏，货物涌贵。虽曰穷边绝徼，殆于内郡富庶无异，而奢靡过之。如元旦，贫富家皆极力办祭祀酒食之类，以丰丽相尚。老幼欢赏，越元宵后方止。”“如中秋市瓜者，总计值银三二千两。衣服以锦绣为常，贫家妇女，必得纱罗，人乃不笑。”

千万不要以为大同地处“穷边绝徼”，而“殆于内郡富庶无异”的主要因素仅仅在于外地客商的长途贩运。在连年战乱的干扰下，明代的大同仍不失为一个物产丰饶的福地宝城。

明代大同军械生产发达，“额造军器每年计件四万二千八百”（明正德《大同府志》）。这一指令性计划，是为数众多的随军铁匠和其他工匠们必须完成的。如果战争消耗太大，还须超额完成。那时候，当地生产的盔、甲、刀、箭样样俱全，还有战车、火炮等重型武器。来大同找把宝刀是比较容易的。

明代大同药材产销两旺，据《大同府志》记载，仅本地特产的中药材就有黄芩、草乌、瞿麦、芍药、防风、知母、黄精、

犁芦、茅香、羌活、大戟、鹿茸、甘草、地黄、黄芪、麻黄、茯苓、茯神、香皮、地椒、地榆、气砂、地蕈、五味子、京三棱、不灰木、金刚骨等，而民间采制的药材达百余种。

明代大同畜牧业兴盛，除牛、马、羊等常见家畜外，在丰稔山还有一种被称之为“完羊”的特产，味美肉鲜。此外这里还野生着一种“黄鼠”，味道极佳，深受人们喜爱。大同的皮货业非常著名，除普通的马、牛、羊等皮张之外，熊皮、豹皮、鹿皮等珍稀皮革、皮毛制品花样繁多。有关资料记载，最晚在明初时，大同各地就能够生产一种染色香牛皮，可制盔甲、箱包等物。《大同府志·土贡》篇记载，仅作为贡品的皮张，就达 3790 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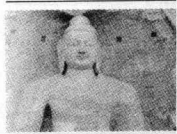
明王朝鼓励煤炭生产，大同煤业得以快速发展。据《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一书记载，明正统十二年（1447），漕运总兵并各处巡抚官工部左侍郎周忱奏报“大同山西数处，产有石炭，军民小户自取烧用，亦被巡拦抽分、纳课，深为不便”。经明英宗批允，“军民自取石炭，免纳课钞”。到明天顺年间，当地军民开采煤炭自用的已非常普遍。

其他如大同玛瑙、花斑石、颜料、砂器、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木器、柳编、酿造等，亦非常著名。而以大同煤烧制的大量城砖，至今还屹立于万里长城的边堡烽墩之上。各地客商在为大同贩运军需的同时，也将大同特产源源不断地捎带回去。蒙古族首领俺答在大同阳和卫赵全等人的怂恿下，为了得到大同地区的内地特产，还不惜无数次纵兵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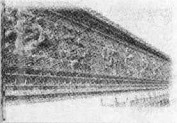
陆路口岸连接四方

明代山西行省之中，九边重镇大同是明王朝官方特许的重要外贸通商口岸。

连接塞上的军事重镇大同，万里长城横亘于内地塞外



明代边市引凤凰



之间,边堡卫所陈列于平川山野之上。明王朝将大同镇的功能,设置为既能扼守京师安全的重要门户,又能确保京师对外联络的“陆路口岸”。

大同是北方蒙古部落进入内地的主要通道,瓦剌、鞑靼等各部落使臣每年入贡时,都必须经由大同“贡道”,在大同这个当时的陆路口岸,接受全山西唯一的“海关”的例行查验,然后等候皇帝旨意,由大同军方护送进入京城。《明史·鞑靼传》记载:“以春月及万寿圣节四方来同之会,使人、马匹及表文自大同左卫验入,给犒赏”;“秋,孛来求款,帝使詹升赍敕往谕。孛来遣使随升来贡,请改大同旧贡道,而由陕西兰县人,许之。……明年春,帝赐玺书奖励,敕孛来使臣仍从大同入贡”。

大同也是西域各国贡使进京入贡的必由之路。西方哈密、吐鲁番、撒马儿罕、波斯、天方等各地贡使,从陆路通道进入嘉峪关后,一路东行来到大同,要在这里作短暂停留。一方面要等待皇帝及相关部门方便的时候,另一方面要等待批准许进京的人数和准入的贡品,这就是所谓的“候旨进京”。

为了保障京师的绝对安全,同时保障外国贡使顺利到达京城,在准许外籍人士通过的关塞上,专门驻扎有精通异语的“达官兵”。达官兵指挥使司的主要职能,是负责盘查进出关隘的外国贡使及商人,验看外籍文书及翻译异语文籍,保障外国使者的安全,护送外国贡使进京并代理贡使进京禀报,其性质相当于现在海关边防武警部队。大同达官指挥使李原,是一位载入《明史》的著名将领。

古时候,各国朝政及部落首领派遣贡使和中国通贡,不妨说是一种以物易物的通商行为。他们以当地特产作为贡品,进京请赏换取自己所需的物品。来华贡使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商人:“番使多贾人,来辄挟重资与中国市”,“先是,

永乐时,成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故西域之使岁岁不绝。诸蕃贪中国财帛,且利市易,络绎道途。商人率伪称贡使,多携马、驼、玉石,声言进献”(《明史·西域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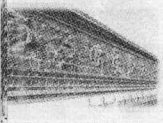
各国首领派遣贡使之前,都要写好呈请,说明进贡的物品和乞赐的东西,由贡使进京面呈皇帝。以异国文字或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呈请,入关后还要由明朝有关部门验看并翻译成汉语,然后再进呈皇帝。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华夷译语》,就是明朝有关部门收留的各国文书原文及翻译的汉语译文。现摘录几段如:“撒马儿罕使臣阿力,大明皇帝前进贡驼二只、玉石五十斤,望乞收受。求讨各色段(缎)子、热药,望乞恩赐,奏得圣旨知道”,“大明皇帝,明同日月,志过乾坤,天下远近,无所不至。奴婢是白思勒地面者法儿撒的革王差来使臣买模,今进金钱豹一对,乞照例给赏便益(宜)”。

蒙古瓦剌部派遣进入内地的人数是各地贡使中最多的。《明史·于谦传》记载了蒙古首领也先进京入贡的一些情况:“先是,贡使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至三千余,赏赉不赙,遂入寇。及是又遣使三千来朝,谦请列兵居庸关备不虞。京师盛陈兵,宴之。”瓦剌部落 3000 多名贡使,进京之前都要先期到达大同。能够一次性接待和宴请这样规模的“商贸旅游团”,可以看出明代大同军政方面的接待能力是比较可观的。

现代口岸边防,只负责境内外人员及境内外商品出入境检验。外宾入境后的安全等问题,另有治安部门负责。明代时的大同陆路口岸,对外国商人实行的是全程跟踪服务。有时候,各地使者人数较多,不可能全部放行入京,这样就有很大部分逗留在边城。明朝政府敕令地方军政,对留在边城的贡使给以妥善安置,对进京人员由军方护送至京城:“驻边者,分送各城抚镇验赏。入京者,押送自居庸关入。”



明代边市引凤凰



（《明史·鞑靼传》）

留在大同的各地贡使，军方各级官员既要引导他们搞好贸易，又要保障他们的饮食起居，还要防止不确定因素引起的治安突发事件。《明史·刘宁传》记载刘宁“为大同副将时，入贡者数万人怀异志。宁率二十骑直抵其营，众骇愕。有部长勒马引弓出。宁前下马，与诸部长坐，举策指画，宣天子威德。一人语不逊，宁捫其面，奋臂起，其长叱之退。宁复坐与语，呼酒欢饮，皆感悟，卒如约”。

相对于大多数内地城镇而言，明代的大同算得上是一座对外开放城市。“入贡者数万人”聚集在大同地面，所形成的贸易场面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外国商人频繁在街市出现，使大同人对异域习俗见怪不怪。广大民众与国外贡使友好相处，佳话频传。嘉靖丙午（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大同清真寺掌教冯时主持重修寺院时，有一批外籍人士踊跃参与，积极捐资，将铭文镌刻在一块巨大的陨石上面，史学专家认为他们是西域国家来华途经大同的贡使。这块陨石铭刻，既是大同回族与外籍贡使友好交往的历史，又是一套珍贵的古代阿拉伯文书法作品。

逗留大同的外国贡使、各民族商贩，临行时都要尽可能带些大同当地特产。“比西归，辄缘道迟留，多市货物。”（《明史·西域四》）明代大同府的工商业行当相对齐全，一些字号专门针对各国商人的不同需求，生产和加工一些便利各国贡使的商品。毛口袋、铜器、皮货等不少大同特产，深受各国贡使喜欢。

大同陆路口岸的存在，使这里出现了“货物涌贵。虽曰穷边绝徼，殆于内郡富庶无异，而奢靡过之”（明正德《大同府志》）的奇特状况。其中物价居高不下的现象，与现今一些经济特区的情形基本类似。

边境互市时盛时衰

明代,大同马市遐迹闻名,远近皆知。按照现在的说法,大同马市当是明代三晋大地上唯一的对外贸易场地,是明代山西南北各地晋商从事边境贸易的主要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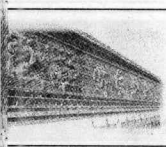
著名史志学者侯长发先生说:“所谓‘马市’,用现代语言讲,就是边境贸易。这种贸易带有互补的性质,是双方共需的。蒙古诸部落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畜牧业发达,盛产马匹,而不能生产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品,而明朝一方与之恰恰相反,骑兵需要不断地补充马匹,内地生产蒙古部落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品,所以这种贸易带有互补性质。”(侯长发《大同历史论文集》)

早在马市开放之前的明朝初期,大同当地的马匹交易已经非常热闹了。只是这种交易还不能算是“官市”,当然也不应该算作“私市”,更不是那种耸人听闻的走私“黑市”。因为此种马匹交易既非官方完全不知情的秘密市场,也不是官方明令禁止的非法贸易活动,只是在官方尚未正式设立马市之前,或者说官方马匹市场还没有发育起来之时,实际存在于大同民间的一种临时性、季节性市场。

交易商品马匹、骆驼的来源,主要由各国贡使带到大同来,其中多为来华后没有被允许进京而逗留在大同各地的贡使。《明史》记载说:“故事,诸番贡物至,边臣验上其籍,礼官为按籍给赐。籍所不载,许自行贸易。贡使既竣,即有余货,责令携归。愿入官者,礼官奏闻,给钞。”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各国贡使携带的物品没有写进文籍的,可以进行自由贸易;贡使回国前没有出手的商品,可以直接带回,也可以和有关部门进行有偿交易。因此,大同的马匹交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为配合滞留大同的各地贡使“自行贸易”,得到明王朝默许而公开进行的小范围马市交易。



明代边市引凤凰



小范围马市的交易额比较有限，而且季节性非常明显（只在贡使来华的时节开设），能够参与这个马市贸易的人，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把持市场的主角，首先是接触各国贡使的大同军政各级官僚和他们的亲属，其次是有钱有势的地方头面人物。黎民百姓想买一匹良马耕田或繁育，必须从垄断交易的二道贩子或三道贩子们的手中，花上几倍的高价来购买。

大同地区由官方正式确立的马市，始于正统三年（1438），当时，大同巡抚卢睿为了让更多的军民能够平价购买到骆驼和马匹，向明王朝请示在大同设立定期开放的马市，平价交易，各得其所，得到明英宗的许可。

最初，在大同进行边境贸易的蒙古部落叫瓦剌。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派出使者和瓦剌部联络，并赐给瓦剌首领马哈木等人一些绸缎。永乐六年（1408），瓦剌部落遣使人朝贡马，明王朝给予了赏赐。第二年夏天，明王朝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从永乐八年（1410）起，瓦剌部每年经大同进京入贡一次。正统初期，瓦剌部落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蒙古各部。正统四年（1439），马哈木的孙子也先（1407—1454）在父亲脱欢死后，承袭了蒙古瓦剌部落首领的职位。

大同马市开设后，官方和百姓与蒙古瓦剌部落互通有无，平价贸易。除国家明令禁止的兵器、铜铁之外，其他物品都随行就市。大同驻军达官指挥李原，精通蒙古语、波斯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被朝廷任命为通事（翻译），并带领达官兵负责马市的市场管理，进行马匹交易。

马市的开设极大地便利了蒙汉各族人民。在其后的10余年时间里，每年前来马市卖马的蒙古牧民达数万人之多。长城内外各族军民分别在官市（军方用官府库银为官方和军队购买马匹）和民市公平交易，互通有无。达官指挥李原